



双语
译林



壹力
文库

030

DUBLINERS

都柏林人



译林出版社

双译译林
壹力文库
030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徐晓雯 译

都柏林人

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

《都柏林人》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早期作品，从而早已有了许多阅读的定式。一般说来，这部作品里强烈的自传色彩、作者日臻完善的实验性技巧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独特的内省特色，是许多读者无法忽视的。

关于乔伊斯的生平，在许多读者都不算陌生。在此不再赘述，只强调一下与这部作品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环节。

1. 乔伊斯对其祖国爱尔兰，尤其是都柏林所代表的爱尔兰，有着错综复杂的情感。

2. 乔伊斯写作的文学大环境与文学传统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

乔伊斯在爱尔兰都柏林长大，青年时期即去国远行，之后很少返回故土，但终其一生，所写作的主题始终不离爱尔兰，尤其是都柏林。他对都柏林的情感是复杂的。在他写作《都柏林人》的过程中，他曾经表示，自己试图通过这一系列故事来揭示城市的精神瘫痪状态。而在后来争取出版该书的艰难过程中，他也曾向伦敦的一位出版商谈到：“在出版商家所列出的书目中，我时常见到以爱尔兰为主题的书名，所以便认为，对于充溢于我这些故事中的堕落气息，人们或许是情愿花钱来品味的。”那位出版商企图劝他删改“有伤大雅”的段落时，他又格外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的初衷，就是要书写我的祖国精神史的一个章节，

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乃是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是瘫痪的中心。我竭力将其呈现于那些漠然的公众面前，从四个方面去展示：童年、青少年、成年，还有公共生活。故事就是按这样的顺序集结的。”他坚决反对别人改动一字。

很多读者和评论家便由此而刻意地把《都柏林人》解读成一部揭露爱尔兰凝滞而无望的精神生活的作品。这样做不无道理，有了乔伊斯本人的注解说明，似乎更是顺理成章。《都柏林人》作为短篇小说系列的主题因此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贯穿全书十五篇故事的主题是死亡与瘫痪，而这些故事的排列顺序也都是按照童年、青少年、成年以及公共生活的内容来决定的。

不过，很多读者和评论家往往忽视了乔伊斯本人对此书以及爱尔兰所表达的另外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多是乔伊斯后期带有反思的一些看法。比如，《都柏林人》问世多年之后，其法文译者试图把题目译成《在都柏林他们是这样的》，乔伊斯便生硬地反驳道：“不，不，《都柏林人》写的是在所有地方我们都是这样——是现代城市生活的经验。”此外，他也曾表示说，民族性表达到极致，就有了国际性。这仿佛都在提醒读者，《都柏林人》表面上浓重的地方色彩有可能掩饰了更深层的普遍含义。说极端些，当我们为文中都柏林人生活的沉闷、停滞而感到压抑的时候，也许仔细对照自己生活的环境和方式，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也面临同一性质的困境。《都柏林人》自其发表之日起，就一直吸引着各种各样态度的读者，或褒或贬，但兴趣始终不减，这种潜在认同的魅力是不可低估的。

我们的生活是琐碎而复杂的。相应地，《都柏林人》的主题也是复杂而细致的。这增添了《都柏林人》在读者眼中的魅力。在某种意义上，《都柏林人》仿佛是一口不会干涸的泉眼，只要我

们有心，似乎总能发掘出新的感受。这里不妨点出一二，以期在读者中，抛砖引玉。

前面已经说过，《都柏林人》是一部关于瘫痪与死亡的系列短篇小说集。从开篇《姐妹们》写弗林神父的瘫痪与过失，到收尾之作《死者》写衰老、中庸，以及死亡，几乎没有一篇故事不是在营造气氛，渲染精神上的安于现状和停滞堕落。具体到世纪之交爱尔兰的国情，政治上摆脱不了英国的统治，宗教上摆脱不了天主教的影响，文化上摆脱不了复古自闭的倾向。智慧而聪颖的爱尔兰人，尤其是都柏林人，似乎走到了死胡同，却无人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冲出樊笼，寻找新的出路；即使有这样的愿望，也常常是在行动的关键时刻屈服于怯懦和习惯，回头做了精神瘫痪的牺牲品。人人似乎都在寻求救赎，结果或者在虚假中感到迷惑和幻灭，或者在未知的可能性面前怯而止步，重新与现状达成无奈的妥协。在这种徒然而悲剧性的努力当中，悔罪似乎成了必然的结局。

我们可以尝试把悔罪作为一个副主题，全面地浏览一下书中的十五个故事。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故事中都描述了各种形式的诉说和对于倾听的渴望，都隐含了悔罪的结局。《姐妹们》中，弗林神父心智上神秘的混乱以及他与“我”，一个孩童之间，有些暧昧的关系，都在“我”奇异的梦境中得到了说明：那神父分明是想要忏悔什么，而“我”被动地成为了别人悔罪的寄托。《遭遇》虽然写的是学童逃学，但那种渴望自由的情绪和之后的幻灭，与人生其他时候的感受别无二致，而“我”与那位神秘年长绅士的遭遇，也是有着明显的忏悔和倾听忏悔的性质，到最后，那年长者悔罪的诉说也影响了“我”，以致我在想到自己的同伴时，也有了悔罪的口气：“我很是懊悔，因为在我心里，我曾经一直有点

瞧不起他。”《阿拉比》中那愤怒的少年分明是在懊悔自己的冲动与渴望。《伊夫林》里，少女初次掌握自己命运的努力，没有被父亲的权威压抑，却在最后一刻向上帝祈求指引的时候，遭到了因悔罪而导致的挫折。《车赛之后》也是在爱尔兰青年吉米的领悟中结束：“他知道到了早晨就会感到懊悔。”人们对于现状的迷惑和不满，都在毫无结果的忏悔中结束，这种宗教情绪只能导致等待和困守。

在书中，乔伊斯也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了剖析。比如家庭。比如政治。乔伊斯本人的家庭，以及乔伊斯眼中很多都柏林人的家庭，是一个失衡的家庭。母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都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中留下伤痕，而孩童长大成人，则进一步引发社会的缺陷。作品中许多情节都涉及家庭的组成和维持，更有一些隐舍的人物关系暗示着种种可能的主题。比如，在《泥土》中，玛丽亚与乔和阿尔菲两兄弟之间的关系：“乔是个好孩子。她照看过他，也照看过阿尔菲，乔过去常说：‘妈妈是妈妈，可是玛丽亚却是我名副其实的母亲。’”这里面，“妈妈”和“母亲”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其背后的伦理意义发人深省。在《对手》中，法林顿试图在外部世界中建立自我的尊严，反而惹来一场当众的羞辱。回到家中，他把这种在外界遭受的强权压迫转嫁给了自己的儿子。《恩典》中描写了这样的一对夫妻：生活中唯一鲜活的只有对当年婚礼的回忆，其他都是忍受与习惯。对于女主人公，宗教都已经成了习惯。《寄宿舍》中，穆尼太太自身的婚姻是一场失败，但这并不妨碍她像算计星期二吃的面包布丁一样，设计自己女儿的婚姻。生活中最基础的家庭生活都已经成为习惯，逐渐变得像账本一样缺乏情感与渴望，社会的生命力从何而来？现代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人性解放的浪潮之后，似乎又通过城市化的步伐，

陷入了另外一种僵局。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都柏林生活的罩衣下，隐藏着现代生活的核心问题，就此而言，《都柏林人》无论如何不会过时。

有些读者或许会觉得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对自己故土缺少了因爱而生的宽容。其实，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且不去说乔伊斯在人到中年时曾慨然叹道：“我何曾离开过（都柏林）？我死之后，你们会发现我对都柏林的感情早已是刻骨铭心。”就只在这些小说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表面冷漠超然的叙述口吻，感受到他对爱尔兰深刻的认同。爱尔兰人的生活中，音乐和酒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十五篇故事中，凡是涉及聚会的场面，似乎都少不了这两样东西。音乐反映出爱尔兰人深沉的文化素养，酒则成了掩盖失意、躲避责任的好东西。乔伊斯对爱尔兰的矛盾情感在他的这些描写中可见一斑。对于爱尔兰的民族音乐，乔伊斯并没有显露出多么大的赞赏。这在当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背景下，难免会引起大众的反感。然而，乔伊斯试图揭示的，并非爱尔兰民族音乐素养的缺憾，恰恰相反，他处处想要说明的，正是爱尔兰民族包罗万象的音乐取向。那些极端强调爱尔兰本民族音乐的民族主义分子，在他笔下，表现出的是民族狭隘主义，不但不会引起真正音乐爱好者的共鸣，反而会因为其背后的政治意图破坏了音乐的美感。比较一下《母亲》中描写的那场音乐会和《死者》中宾客们关于都柏林人歌剧爱好的讨论，乔伊斯的态度一目了然。实际上，乔伊斯本人的写作也反映出爱尔兰民族音乐素养的影响，他对语言音乐性的掌握几乎是所有评论家众口一词称誉有加的。可惜，译者殚精竭虑，终不能将其译出一二。

爱尔兰人/都柏林人的包容，还表现于他们热衷于聚会。十五篇小说中，酒吧的热闹、家庭的小聚、逢年过节时的歌舞盛

宴——这似乎成了乔伊斯笔下都柏林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爱尔兰人好客热情的天性，也在这些记录中展现在读者面前。乔伊斯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也曾多次谈到爱尔兰民族的包容与好客。《都柏林人》的前十四篇小说，似乎写得相当冷静客观，到了最后的《死者》中，乔伊斯却把笔锋一转，借加布里埃尔·康罗伊的祝词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中间那渐渐衰老的一代人，或许有他们的不足之处，但是就我而言，我认为他们的品质中确实有热情好客、幽默风趣和人道主义的方面。”

《死者》实在是一篇压轴佳作。无论就其语言、风格、主题、意象来说，都丰富而深刻。难怪历来编纂短篇小说文集者，都舍不得丢下它。阅读过程本身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作为读者，可以参与对文本的诠释。《死者》出现在描写死亡与瘫痪的系列终端，人们很自然地就把它主题与全书的主题连接起来。然而，放到乔伊斯一生的创作过程中来看，《死者》并不仅仅是《都柏林人》的一个结尾。在这个故事中，蕴涵了开端。

乔伊斯写作的年代，法国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运动已然在整个欧洲的文学创作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左拉和莫泊桑的艺术手法在《都柏林人》中都有反映。而在挪威，有一位戏剧家则对乔伊斯的创作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这就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易卜生。乔伊斯对易卜生的崇拜，始自青年时代。易卜生创作的主题是揭示资产阶级精神的死亡，但更重要的是，他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毁灭之后。他曾经写过一部名为《我们死者苏醒的时候》的剧本，结尾就是男女主人公勇敢地摆脱了旧的自我，在肉体消亡的时候，获得了精神的重生。在《死者》中，乔伊斯以背景音乐般的隐晦，重复了这一主题。

《死者》可以说是主人公加布里埃尔认识自我，逐渐与爱尔兰

和解，并得到重生的过程。这里面有乔伊斯本人的心路历程。就像加布里埃尔一样，乔伊斯也是一位语言教授，对语言也是十分着迷，也曾经为英国报刊写过书评，甚至他的妻子诺拉年轻时代也曾经有过一位像米迦勒·富里一样为爱而死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对于语言的着迷在他准备晚餐致辞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中对于不同层次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一现象，加布里埃尔的认识可谓与乔伊斯如出一辙。乔伊斯在写作时，始终在追求风格与内容的完美统一，甚至于为了表现停滞、死亡与瘫痪的主题，就刻意改变自己对于语言多样性的偏爱，大量使用平白而单调的句式和词语。而在写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时，他更是手法熟练地把婴儿语体与斯蒂芬的童年回忆，宗教文书与斯蒂芬的忏悔反思，学院文体与斯蒂芬对艺术的思考，日记风格与斯蒂芬的内心领悟结合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地步。到了《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中，读者则已经很难分清风格与内容，谁是主谁是宾了。可是与加布里埃尔不同的是，乔伊斯的妻子诺拉虽然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却具有爱尔兰人特有的才情、宽容和真诚。乔伊斯在其影响下，真正领悟了爱情与生活。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塑造加布里埃尔的时候，把这个角色的残缺与希望描写得入骨三分。

加布里埃尔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慢，也有着天性中的热情与宽容，所以他在由衷地想要躲避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很激烈的方式。但这也给了他救赎自身的机会。他在身处热闹晚宴之时，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心是在外面白雪皑皑的世界中。他在包容的过程中，开始逐渐睁眼去看自己的民族文化。宴会结束的时候，他的妻子格雷塔在聆听一首爱尔兰古歌。他也全神贯注，不过并不是在听歌，而是在欣赏格雷塔。这个场

景很富有象征意义。格雷塔深谙爱尔兰文化的精髓，但与民族主义者艾弗斯小姐不同。她的性格特点是敏感而宽容。至于此时的加布里埃尔，则完全沉浸于有点自以为是的爱情和旁观的愉悦之中。他开始从拒绝面对格雷塔浓重的爱尔兰色彩转变为冷静地接受。甚至有些欣赏。当格雷塔把那一段生死相许的爱情和盘托出后，他自己的爱情因而变得苍白无力了，他的灵魂却受到了震撼。他承认了真爱的存在，承认了自身的不足，甚至在渐渐袭来的梦境中，承认了去追随那未知世界的愿望。他的宽容弥补了他先前的狭隘。正如极端的民族主义排斥任何外来影响一样，他从前的清高其实是一种对民族特色的绝对排斥。而现在，他知道了，在爱尔兰西部的乡野中，有一个名叫米迦勒·富里的年轻人，曾经用纯粹的爱尔兰民歌和充满激情的生命，演绎了真正的爱情。他也知道并勇敢地承认了，对于这样的爱情，他无缘亲身感受。

宽容的泪水充满了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自己从没有对哪个女人有过这种感情，可是他却知道这一定就是爱情。眼泪在他眼眶中越积越多，在半明半暗中，他想象着自己看到了一个年轻男人站在一棵滴雨的树下。在近处还有别的形影。他的灵魂接近了众多死者栖身的居所。他感受得到他们那飘忽不定忽闪忽现的存在，但是他却无法体验清楚。他自身正消融进了一个难以捉摸的灰色世界：而这边实实在在的世界却正在消解、消失，这些死者曾经一度生长居住其中。

窗玻璃上传来几声轻轻的敲打，他朝窗户转过脸去。又开始下雪了。他困倦地看着雪片，银白而灰暗的雪片，斜斜地落在路灯上。到了他动身西去的时候了。是的，报上说的对：爱尔兰普遍都在降雪。雪落在黑暗的中央平原上的所有地方，

雪落在不长树的小山上，雪轻柔地落在艾伦沼泽上，往西再走远一点，雪轻柔地落入香农河奔腾着的黑色波涛中。雪也落在小山上那孤零零的墓地的每个角落里，米迦勒·富里就埋葬在那里。雪厚厚地飘落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和墓碑上，飘落在那小小墓门的尖栅栏上，飘落在荒凉的荆棘上。他的灵魂慢慢迷离，他倾听着雪隐隐地从宇宙洪荒中飘落而来，隐隐地飘落，像最后时刻的来临一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这是故事著名的结尾。优美，祥和，充满象征意义。然而，关于那无所不在的雪究竟象征着什么，却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全书来看，这既是一个终止符，也是一个序曲。是外表死亡的反应，也是内心重生的表现。或许，把它解释为一种联系会更贴切。而意识到这种生死相连关系的，是初具艺术家气质的加布里埃尔。作为艺术家的加布里埃尔，既与热闹的现实世界有精神上的隔阂，又与缺乏理性的情感高潮有距离，恰好可以在游离间置身事外，清楚地感受到事物本质的联系。并且，由这种领悟中，衍生了真正的精神存在。

阅读乔伊斯是一种费力而有趣的经验，因为他的作品丰富的寓意会带给读者无穷无尽发现的兴奋。但是翻译乔伊斯就是一件痛苦多于狂喜的经历了。现在，译稿付梓，我似乎也无法再去做些什么了。只有期待智慧的读者们，以宽容的眼光阅读我这些心血文字，并原谅我灵性的不足。好在乔伊斯的这本书的英文版，译林出版社早有刊行，读者们总还有探本求源的路径，我的罪孽可以小些了。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德恩教授，是他一直以鼓励的目光，注视着我走上翻译的道路，并以师长的严厉和提携，自始至终关照着事业的成长。

我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爱尔兰文学专家陈恕教授，是他在我一筹莫展之时，无私地为我提供帮助，把很多有关乔伊斯的参考资料借给我，使我茅塞顿开。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徐敏铎先生和张静霞女士，我翻译这部书的这段时间，也正是我生活中最为忙碌辛苦的一段日子，如果没有他们二老的关心、支持，以及实实在在的帮助，我是绝对做不完这件事的。

徐晓雯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日

都柏林人

姐妹们

这一次他是没有希望了：这是第三次中风。一夜又一夜，我从那所房子旁走过（正是放假的时候），端详那亮着灯的方窗框：一夜又一夜，我发现那里亮着的是同样的灯光，微弱而平稳的灯光。我想，倘若他死了，我就会看到暗淡的窗帘上有蜡烛的光影，因为我知道人死之后，人们会在尸体头部边上搁上两根蜡烛。他曾常常对我讲：“我在今世待不久了。”而我却以为他的话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明白这些话原是当真的。夜夜我抬头凝视着那扇窗，轻轻自言自语“瘫痪”。在我听来这个词总是怪怪的有点刺耳，就像欧几里得几何中的“罄折形”，又像《教义问答手册》里“买卖圣职罪”。但如今在我听来，它却像是某种心怀叵测的邪恶事物的名字。它令我充满恐惧，我却渴盼靠它更近一些，好观察它是如何置人于死地。

我下楼来吃晚饭，老科特正坐在炉火边抽烟。姨妈舀出我那份麦片粥，这时他就好像是回头去说先前的某句话似的说：

“不，我不想说他就是……可是有点怪异……他有点怪模怪样的。我跟你们说说我的看法……”

他开始一口口猛抽烟斗，无疑心里正在编排自己的看法。讨厌的老傻瓜！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讲刚酿出的浊酒和弯弯曲曲的酿酒管道，那时还挺有趣；可是很快我就烦透了他和他那些没完没了的酿酒厂故事。

“我自有一番道理，”他说。“我认为这是那类……罕见的情况……但是难说……”

他又开始一口口猛抽烟斗，并没有给我们讲他的道理。姨父看到我瞪着眼睛，就对我说：

“哎，这么说你的老朋友过世了，你听了一定很难过吧。”

“谁啊？我说。”

“弗林神父。”

“他死了？”

“科特先生正跟我们说呢。他刚路过那房子。”

我知道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就接着吃饭，仿佛这消息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姨父对老科特做了解释。

“这孩子和他很要好。知道吧，那老伙计教了他很多东西；而且据说他对这孩子有很大指望呢。”

“上帝怜悯他的灵魂吧，”姨妈虔诚地说。

老科特瞧了我一会儿。我感觉到他那双又小又亮的黑眼珠子在审视我，可是我偏不要从盘子上抬起头来满足他。他又去抽他那烟斗，最后粗鲁地朝火炉里吐了口唾沫。

“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们，”他说，“跟那样一个人有那么多话可说。”

“你想说什么呀，科特先生？”姨妈问。

“我想说的是，”老科特说，“这对孩子们不好。我的意见是：要让小孩子四处跑跑，和年龄相仿的小孩子一块玩，不要……我说的对吧，杰克？”

“我也是这个原则，”姨父说，“要让他学会出去闯自己的天下嘛。我一直就是这么对那边那位玫瑰十字会会员说：锻炼身体。哎，当年我是小娃娃的时候每天早晨都洗冷水澡，冬天夏天都洗。

而且这个我如今还坚持着呢。教育很不错，很广泛的……科特先生该尝一片羊腿肉啊，”他又对姨妈说。

“不，不，我就免了吧，”老科特说。

姨妈从菜橱里取出那盘菜，摆到桌上。

“可是科特先生，你为什么认为那对孩子们没有好处呢？”她问。

“那对孩子们不好，”老科特说，“孩子们的心灵很容易受人影响。他们见到那样的事情，后果就是……”

我在嘴里满满地填上麦片粥，唯恐自己会把愤怒吐露出来。红鼻头的老蠢货，真讨厌！

我睡着时已经很晚了。尽管老科特说我是小孩子，我很生他的气，可是我却绞尽脑汁要从他没说完的话里提炼出意义来。在黑暗的房间中我想象着又看到了那瘫痪病人忧郁灰暗的脸庞。我把毯子拉上来蒙住头，使劲去想圣诞节。可是那张灰暗的脸庞仍然追着我。它咕哝着；我明白它很想忏悔什么事。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退缩到了某个又舒服又堕落的区域；在那里我又发现它正等着我。它开始用咕咕啾啾的声音向我忏悔而我却想知道它为什么不停地微笑为什么唾液湿润了那双嘴唇。但随后我想起来了它已经死于瘫痪然后我感觉我也无力地微笑起来似乎是要赦免他买卖圣职的罪。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我去看大不列颠街上的那幢小房子。这是间平朴的铺面，店名写得模糊，叫“布匹服装”。布匹服装主要包括小孩子的毛线鞋还有雨伞；平日常常在窗口挂一份招贴，写着“更换伞面”。现在看不到招贴了，窗板是关着的。一把黑绉纱的花束用丝带系在门环上。两个贫穷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邮童正在看别在黑纱上的卡片。我也凑上去，读道：

一八九五年七月一日

詹姆斯·弗林牧师（先前曾在米思街的圣凯瑟琳教堂供职）
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愿他安息。

读着这卡片，我就相信他的确死去了，我不安地发觉自己有所顾忌起来。倘若他没有死去的话我就会走进店铺后面那间小黑屋子，就会看到他坐在炉边那把扶手椅里，大衣包裹得他都快要透不过气来。或许姨妈就会交给我一包送给他的海伊·托特牌鼻烟，而这份礼物就会从木然的瞌睡里唤醒他。总是我替他把包里的海伊·托特倒进他那个黑鼻烟盒里，因为他的双手抖得太厉害使他无法做到既把东西倒进去又不把一半的鼻烟撒得地板上都是。甚至当他抬起颤抖的大手把鼻烟送到鼻子边时小片小片的烟云也会点点滴滴地从指缝中漏在大衣前襟上。很可能就是这些一阵阵不断落下的鼻烟使他古旧的牧师服饰看上去成了绿乎乎退了色的模样，所以那条红色手帕很是不管用，事实上总是这样，手帕上因为洒落了一个星期的鼻烟粉而颜色灰暗，他还试图用它来掸掉那些洒下来的粉粒。

我很想进去看看他可是我没有勇气敲门。我慢慢地沿着街道有阳光的那一边走开，一边走一边看着商店橱窗里所有的剧院海报。我和这天色都似乎没有悲哀的情绪，我觉得这很古怪，我甚至觉得烦恼，因为我发觉自己有种自由的振奋，仿佛他的死亡把我从某种东西中释放出来了。我对此很诧异，因为正如姨父头天晚上说的那样，他曾经教了我很多东西。他曾在罗马的爱尔兰学